

在地图上又标上一个“矮人国”。但在艾儒略的《万国全图》上,没有“诺尔京”这个地名,但把“矮人国”几个字北移到利玛窦所标“诺尔京”的地方。在揭暄摹绘的“大地圆球五州全图”上,如同艾儒略的地图一样,没有“诺尔京”,却有“矮人国”。而且,在艾儒略的《万国全图》上,连接“矮人国”与欧洲大陆的陆地被画得过于狭小,揭暄在摹绘时可能把这条狭小的陆地忽略了,误将“矮人国”绘成欧洲大陆以北的一个孤立海岛。揭暄的另一处错误是,把北美洲的“新拂郎察”误为“拂郎察”。所谓的“拂郎察”,是指欧洲的法国(今译作法兰西),而“新拂郎察”则是指法国在北美洲的殖民地“新法兰西”。

《天文图说》中揭暄所摹的另一幅地图是“亚细亚一大洲图”,揭暄在图旁还加上一段文字说明:亚细亚洲“西起那多里亚,东至亚泥符岐一百一十八度。南起爪哇,北至冰海八十四度,东西二万九千五百里,南北二万一千里”。这段文字在艾儒略的《职方外纪》中是:“其地西起那多理亚,离福岛六十二度;东至亚尼俺峽,离一百八十度;南起爪哇,在赤道南十二度;北至冰海,在赤道北七十二度[7](p.32)。”而利玛窦在他的世界地图上,对于亚洲的界限是这样表述的:“若亚细亚者,南至苏门答腊、吕宋等岛,北至新曾白蜡及北海,东至日本岛、大明海,西至大乃河、墨河的湖、大海、西红海、小西洋。”比较一下,可以清楚地知道,揭暄的“亚细亚一大洲图”也是来自艾儒略的《职方外纪》,而不是利玛窦的作品。

虽然,《天文图说》中揭暄所摹的两幅地图都来自艾儒略,而非利玛窦,但此书中的其他许多内容却是从利玛窦的《坤舆万国全图》或《两仪玄览图》上抄录的。如“九天地球诸星总论”,实际上是把《坤舆万国全图》右侧的序文“地与海本是圆形而合为一球”,与地图左侧的“论地球比九重天之星远且大几何”两文进行删节后汇编而成的,并把利玛窦写在地图中间的署名“万历壬寅(1602)孟秋吉旦欧逻巴人利玛窦谨撰”,改作“万历戊戌(1598)孟冬谷旦欧逻巴人利玛窦撰”作为署名;“天地仪图”即利玛窦世界地图右下方的“天地仪”图;“周天黄赤二道错行中气界限图”及其文字说明,在利玛窦世界地图中出现在左下方;“四行解”录自利玛窦世界地图右上角《四行论略》中,并把利玛窦写在“周天黄赤二道错行中气界限图”后面的“欧逻巴人名为曷捺楞马云”,改作“欧逻巴人曷捺楞马著”作为署名^①;《天文图说》抄录了利玛窦写在世界地图下方的“看北极法”,但不知为何把作者题作“崇祯壬申岁(1632)仲春望日无障道人述”;此外,袁启还辑录了利玛窦世界地图上的“九重天图”、“日蚀图”、“月蚀图”及其文字说明。《天文图说》中还有“中星解”一文,署名为“万历庚戌岁(1610)孟冬望日袁启识”,此文当为袁启自己所撰。

综上所述,我们认为,浙江图书馆所藏《天文图说》抄本的形成过程应当是这样的:1632年,袁启编辑了此书;清朝初年,有人又将揭暄的地图加到袁启的抄本中,于是就有了我们现在所见到的抄本。揭暄所摹的两幅地图,在其他地方尚没见到过;《天文图说》还抄录了利玛窦的许多论述。因此,此书反映了明清之际欧洲传教士对中国人的影响,反映了近代西方科学在中国的流传,这也是这部抄本的主要价值之所在。

[参考文献]

- [1] 袁启.天文图说[A].续修四库全书编辑委员会.续修四库全书本[Z].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1995-2002.
- [2] 有云里.璇玑遗述提要[A].薄树人(主编).中国科学技术典籍通汇:天文六[Z].郑州:河南教育出版社,1998.275-277.
- [3] 盛漠.揭半斋先生父子传[A].中国科学技术典籍通汇:天文六[Z].郑州:河南教育出版社,1998.290-291.
- [4] 阮元.畴人传:卷三六[A].杨家骆.畴人传汇编[Z].台北:世界书局,1982.
- [5] 何之润.璇玑遗述跋[A].中国科学技术典籍通汇:天文六[Z].郑州:河南教育出版社,1998.
- [6] 揭暄.璇玑遗述·“地圆”:卷二 1033 册[M].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续修四库全书本,1995-2002.
- [7] 艾儒略.职方外纪:卷一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96.
- [8] 洪业.考利玛窦的世界地图[A].洪业.洪业论学集[Z].北京:中华书局,1981.150-222.

周济本于立意的“词史”新说

施 霖

(浙江大学出版社,浙江杭州310028)

H B

周济“词史”新说的理论贡献,主要在于他能从词的艺术特征出发,以艺术审美的眼光来总结词的创作和批评,将词的研究从经学复归于文学本位中来。周济的这些理论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:一是在“其辨说多主张氏之言”的

^① 利玛窦所说的“曷捺楞马”是 Analemma(意为“升得高高”)的音译,它其实不是人名,而是古希腊一种测量高度与距离的方法,也有人用此名作为书名。参见 J. B. Harley and D. Woodward, *The History of Cartography*, vol. 1,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, 1987 年版,第 232 页注 66。

基础上,对词意作出新界定,强调词也应当反映社会现实;二是在强调词的社会内容和经世内质时,还提出了所有这一切盛衰之感慨,皆出于作者之“性情、学问、境地,莫不由衷之言”,是作者对人生反复体验的真切产物之观点;三是体现为一种社会功能与自我实现相统一的特色。周济论词,在重视意格、上攀《风》《骚》中,还融入了“平矜释躁”、重自我表现等心理功能方面的内容。作为常州词派的重要理论家,周济的这些词学思想一直影响到晚清以王鹏运、况周颐为首的临桂词派。

那么,是周济是怎样在“其辨说多主张氏之言”^[1]的基础上,对词意作出新界定的?我们知道,张惠言论词,十分注重微言大义,而这个“大义”,又常常是通过“离别怀思”、“感士不遇”来曲折表达的。张惠言从未要求词正面去反映深广的社会现实,批判社会黑暗。而周济则在承张惠言提高词之立意品格的基础上,特铸新的“词史”范畴,强调词也应当反映社会现实。在《介存斋论词杂著》中,他提出了著名的词史说:

感慨所寄,不过盖表:或绸缪未雨,或太息厝薪,或已溺己饥,或独清独醒,随其人之性情、学问、境地,莫不由衷之言。见事多,识理透,可为后人论世之资。诗有史,词亦有史,庶乎自树一帜矣。若乃离别怀思,感士不遇,陈陈相因,唾津互拾,便想高揖温、韦,不亦耻乎!^[2]

在这里,周济明确表明,词之大义之所在,寄托之所重,当是时代之大感慨,而非小小的、个人一己的“离别怀思”、“感士不遇”之类“陈陈相因,唾津互拾”的士大夫私人之遭际。在周济看来,这些陈言与“词史”了不相类,表明了自己“与二张、董氏各存崖略”的观点,并对关于社会盛衰之政治感慨的内涵作了阐述,即“绸缪未雨”(语出《诗·风·鵲鹄》,言周公旦对社会危机有预感,能防患于未然)——对“殆将有变”的社会态势的预感和防患与未然的准备;“太息厝薪”(语出贾宜《新书·数宁》,是对麻木不仁、苟且偷安的愤慨)——对苟且偷安、危机四伏的黑暗现实之忧虑;“已溺己饥”(典出《孟子·离娄下》,是赞扬夏禹、后稷对生民的疾苦有切肤的感受)——对困于动乱频仍之民生疾苦的切身感受;“独清独醒”(源出《楚辞·渔父》,是说要师法屈原,不苟合取容)——面对浊世而不苟合取容的独善其身。总之,所寄之情,无不像禹王、后稷、周公、屈子、贾生一样,关乎时代社会、国事民生之大问题、大盛衰,从而为词之“大义”所在,烙上了引人注目的强烈的社会印记和经世色彩。

周济自幼接受的是文学“贯乎道”、“济乎义”的传统理论,同时,作为常州词派的后继者,又受词学理论于二张、晋卿,论词视词赋同源,讲究词的意格之所在。而作为一个生长于嘉道年间,“日之将夕,悲风骤至”之时代的有识之士,势必更为重视词学的社会内容,排斥“庸格”“浅钝”之无聊词章。周济的词史说,很清楚是把词视作和负有经国大业之使命的诗文一样看待的,感慨所寄,多关于“盛衰”二字,并以此独树一帜。值得注意的是,在这段话中,周济在文学与社会关系的问题上,已然修正了张惠言之立意内容,其现实主义价值取向有着比张惠言较为客观的、更为进步的识见。

在《介存斋论词杂著》中,周济指出:

叔夏所以不及前人处,只在字句上著功夫,不肯换意。若其用意佳者,即字字珠辉玉映,不可指摘。近人喜学玉田,亦为修饰字句易,换意难。^[2]

由此观之,在“修饰字句”与词之“用意”之间,周济是以意为先,首先强调的是词的立意与词品。在他看来,用意佳了,字句也自然会珠辉玉映,光彩照人。这与张惠言以立意为本之词学思想一脉相承。但其“意”之内容,却与张惠言有很大区别。张惠言强调的是“感士不遇”和“离别怀思”,从中去婉转“讥切当世”,最终目的仍是“为君”;而周济“用意”之内涵,却偏是鄙弃“离别怀思,感士不遇”之类陈陈相因之内容,并视其为“唾津”,而代之以“绸缪未雨”、“太息厝薪”、“已溺己饥”、“独清独醒”之社会盛衰大感慨。其《介存斋论词杂著》(二十六)云:“中仙最多故国之感,故着力不多,天分高绝,所谓意能尊体也。”^[2]这更表明,只要“用意”“多故国之感”,则不必多着力于修饰,词章自然高绝。好的用意,也即反映了社会盛衰之“立意”,能使词体不再沦为“诗余”之“小技”、供人消遣之艳章,词也就自然能跻身诗文之例,言志载道,反映盛衰,词体也就自然得以“尊”了。

这里,周济所“寄托”之“大义”,虽不排除为君为道的一面,但也包含着为家国之“盛衰”的一面。“绸缪未雨”也罢,“太息厝薪”也罢,莫不出于“盛衰”。虽然,家国之盛衰也关涉王朝之盛衰,但处于鸦片战争前夜之中国社会这样的独特“境地”(这也正是周济特别强调的),“独清独醒”的有识之士所看到的,显然已不只是社会内部政治形势的日趋恶化和民穷财尽、国势式微的现实,更有外患日逼、西方资本主义侵略势力骎骎东来的严酷事实。因而,周济所寄托的感慨,实际上已经突破了张惠言词学功能论中,词仅为封建王朝服务的狭隘圈子,而含有一定的救时济世、御侮自卫的忧患意识和经世致用的内质了。

〔参考文献〕

- [1] 潘曾玮.周氏词辨序[A].黄苏.清人选评词集三种[Z].济南:齐鲁书社,1988.
[2] 周济.介存斋论词杂著[A].黄苏.清人选评词集三种[Z].济南:齐鲁书社,1988.191-199.